

誠靜怡與五年奮進運動

「五年運動」乃中國教會在三十年代發起充全國大型奮興佈道運動。中國教會在1922-1927年間面對著「非基督教運動」[1]的挑戰與打擊，普遍的教會均欲振乏力，元氣大傷。就在此時，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會長誠靜怡博士發起了這五年奮興佈道運動，給當時的教會帶來了莫大的祝福與復興，並推動了當時席捲全國的福音熱潮。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去回顧這一段寶貴的歷史，從中找尋出適用於今日的借鏡。

一．誠靜怡小傳

特殊的成長背景

誠靜怡字敬一，1881年出生於北京。他的父親是滿州人，但思想比較開通，認為八旗子弟大多貪吃懶做不成器，所以生了男丁也沒有向朝廷申報領取皇糧，情願過簡樸的生活[2]。某次，他的父親因病進入了基督教醫院，有機會閱讀馬可福音，對耶穌的受死代贖很是感動，從此皈信基督，並在北京倫敦會一所教會擔任傳道，事奉了25年，帶領了全家歸主，後來成了倫敦會牧師。誠靜怡的童年受到中國傳統教育的孕育，然後進到倫敦會在北京設立的英華書院就讀；1896年畢業以後，轉入天津養正書院讀神學，1900年畢業。義和團運動期間，誠靜怡全家進入東交文巷使館區避難。

1903至1906年，他轉赴倫敦協助母會牧師歐文 (George Owen) 從事翻譯及校正和合本的新約部份。兩人在三年零二十天內完成新約的譯本，並於1906年出版，這是歸功於誠靜怡精通中英語文，和合本的北京官話能夠順利出版主要是他的傑作。[3]1906年，他在格拉斯哥 (Glasgow) 的聖經訓練學院 (Bible Training Institute) 進修，攻讀神學課程，於1908年畢業，隨即在北京市胡同的教會任職傳道。誠靜怡負笈海外唸神學，幾年在英國的生活與事奉，都開拓了他的事奉領域及國度觀念，並孕育出他日後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。

熱心於公職的事奉

他於1910年被委為中國教會的代表，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發言，在七分鐘之內列舉七點中國教會自立的意見，一舉成名[4]：1912年誠靜怡出任基督教中國諮詢顧問委員會秘書，因著工作的需要，要到全國各地與教會領袖及各教會機構的負責人，共同磋商及作意見上的交流。1913年世界基督教學生運動創始人兼主席穆德 (Dr. John R. Mott) 來華，推動 1910年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倡導的宣教合作精神，使中國全國宣教會議召開後的續行委辦會正式組織起來，誠靜怡被委為執行秘書，他的領導角色漸漸被眾教會所認同。在他的領導下，先後在全國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國基督教年鑑 (China Mission Year Book)，及編製中英文版的中華歸主雜誌 (China Occupation)。

1916年，袁世凱稱帝，擬尊孔教為國教，誠靜怡站在基督教立場上竭力反對，並發起信教自由運動。[5]1922年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，誠靜怡當選為總幹事，繼續負責在全國推動教會間的合作與中國教會自立的工作。1927年，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成立，誠氏被選為會長，這是他努力推動打破宗派窒礙教會發展的成果。1934年他轉任為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總幹事。

致力推動本色教會運動

自1807年馬禮遜來華，福音的發展舉步唯艱：及至鴉片戰爭以後，傳教受到條約的保護，可以在沿海以至中國的內地開展福音工作，但卻漸漸令教會染上了帝國主義的色彩。中國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歷史，由鴉片戰爭、英法聯軍、中法戰爭、甲午戰爭與及八國聯軍等戰史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越演越烈：而當時的中國教會卻充滿著外國的色彩，時常被批評為帝國主義的侵華代表，特別是誠氏所身處的時代，無論國共兩黨都痛恨帝國主義，而且矛頭也直指著傳教士所建立的中國教會。

誠靜怡作當時的教會領袖，在嚴峻的挑戰下，作出了勇敢的回應。他於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中鄭重的宣告：「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，在中國能看見一個合一的基督教會出現，沒有任何宗派及教派的氣質。」[6]自此以後，他便致力推動建立由中國人來辦理的「自理」、「自養」、「自傳」的中國化教

會，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，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，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。[7]其實考查教會的歷史，「最早提出自立觀念者，是美部會 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) 的安德生 (Rufus Anderson, 1796-1880)，他認為宣教工場的教會，必須自理、自養、自傳（簡稱三自），才能有實質的增長。另一位同期的英國傳道會 (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) 領袖溫亨利 (Henry Yenn, 1796-1873) 亦推出，宣教仿如支搭棚架，當房屋築好了，棚架便要拆掉。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三自的觀念常在傳教刊物中出現，備受多方面的討論。」[8]

本色化教會運動乃當時中國基督徒的一大覺醒，務使教會擺脫帝國主義的色彩，誠靜怡曾經這樣評論：「基督教百年前入中國，恃條約為護符……遺留下今日非教的種子。」[9]自誠靜怡等教會領袖的推動下，中國教會在自立與合一上向前邁出一大步，由中國信徒自己建立的教會如雨後春筍的湧現起來。

編寫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

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(1914—1936) 的出版，是由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輯出版，有關此年鑑之誕生、維持與發展，誠靜怡博士實在功不可沒。在當時的通訊與交通的困難下，他仍努力不懈，每年將各差會、各地區教會、佈道事工及慈惠服務等的某本資料及發展趨勢記錄下來，還對教會歷史之三大問題提上討論：[10]（一）中國教會與西教會的關係。（二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協調，即中國教會本色化問題。（三）政教問題。

年鑑的內容與執筆者，大多是當代教會的名牧與領袖（如賈玉銘、丁立美、石美玉、余慈度及誠靜怡本人等），由於記錄了當時珍貴的資料，以及各領袖所推動的事工，讓我們對了解昔日的中國教會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，並可在其中發掘出寶貴的屬靈遺產。誠靜怡當年以無窮的魄力去編寫這部年鑑，及至1937年中日戰爭的發生，結果後繼無人之下而停刊，殊為可惜；但誠氏對教會歷史與資料的尊重，卻是我們值得學習的。反觀今日的香港教會卻只重眼前實務的迫切性，而忽視了歷史的記錄，很多寶貴的經驗與屬靈傳統，可說很容易便湮沒於歷史的長廊之中，不復再現。

綜觀誠氏的一生，致力於中國教會的自立運動與及福音奮進運動，由於他曾經留學外國，與及加上他對普世教會事務的認識，所以在國內以至國外的教會界中均被視為舉足輕重的領袖。例如1928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教會會議，他在大會中被選為副主席[11]：他一生共獲得三個榮譽博士學位，是分別來自美加及國內的著名學府。他最後於1939年病逝於上海仁濟醫院，享年58歲。

二．五年奮進運動

1927年中華基督會全國總會成立，誠靜怡被委任為會長。在他致力推動下，發起了一項在近代中國教會史中規模最大，影響極為深遠的「五年運動」（簡稱五運）。這運動是期望於五年之內，致力推動全國的佈道事工，以及提倡多項教育和社會建設，使到現有信徒質量深進，數量倍增。「五運」的口號為：

「主啊！奮興你教會，先奮興我！」這口號乃誠靜怡提出，可見其在這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五年運動產生的背境

當時的政局

20年代乃中國政治非常動盪的時期，對外受到日本的欺凌滋擾，對內則受到列強侵略及軍閥割據。國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因而排外情緒日高，國共兩黨均致力於推動人民打倒帝國主義，因而於1922-1927年發動了一連串非基督教運動（簡稱「非基運動」），向教會及信徒進行攻擊與挑釁，因為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。

1924-1927年國民政府進行北伐。1925年因排外運動更發生五卅慘案事件，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。1927年發生南京事件，排外情緒日增，英日領事館受攻擊，多名外國人遭殺害，外國宣教士亦因受到迫害而紛紛撤離中國。同年，國共兩黨分裂，最不幸的是於1928及1930中國受到國際金融風波及水災的影響，經濟大受打擊，人民生活飽受摧殘。

教會的狀況

中國教會於非基督教運動打擊下，不少教堂被軍人佔用，財產被匪徒掠劫，外國宣教士亦被迫撤離。教會經濟支援亦因此受阻，信徒陷入沮喪和絕望之中，一時無法振作起來。此時的教會領袖如誠靜怡等人，開始反省如何使基督教在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振作起來。

為了奮興教會沉寂的境況，復興信徒的信心及實踐建國的使命。正如另一位教會領袖趙紫宸所言：「當教會面對困境，停滯不前時，信仰能夠絕處帶出新生，從死亡之中開出新路，這是基督教信仰的偉大之處。」[12]因此在這些教會領袖推動下，便嘗試以「五年奮進佈道運動」來振奮各地教會和信徒，使教會復興起來。

五年運動的形成

1930年召開了杭州會議，邀請了全國的教會領袖發表對奮進佈道之意見，最後順利通過並加以推行「五年運動」。與會的教會領袖一致認為，任何的進步必須基於基督徒本身靈性的復興，藉著更勇敢的基督徒生活去傳揚福音。基於這種信念，在五年運動各部之推動工作外，它就特別著重靈性復興、團契小組和退修會。[13]對內奮興信徒靈性，對外闡明福音並作大規模的宣傳，五年的奮進佈道運動就此發起。[14]

五年運動的目標與推動

五年運動的目標乃期望於五年內致力全國佈道運動，議定有佈道、識字運動、宗教教育、基督化家庭、受託主義、青年事業、教會鄉村等七大工作計劃。[15]

佈道事工上的形式[16]

環遊佈道

提倡教會組織各類型佈道團：有家庭、個人、醫院、監獄、商店、學校、工

廠、平民、鄉村、舟車。每團至少有一人，包括書記、會計、團長在內。

聯合佈道大會

同一城市之各教會，在同一時間開佈道會，任何人經過不同地方都有機會聽聞福音。

團契運動

著重團體或個人靈性的操練，其效果非常顯著，能帶出個人在實踐上有很好的見證。靈性上有四大目標追求：（一）極端誠實（二）極端清潔（三）極端愛心（四）極端無私。

奮興會

在東西、南北各地舉行奮興會，參加的人盈千累百，有軟弱者透過奮興會復興其靈性，繼而往外傳福音遵主的使命。

靈恩會

在山東顯著興旺，多以唱靈歌、說方言、見異家，雖重於感情上的抒發而忽略理智，但在行為上也熱心於佈道事工。

福音廣播

每日節目內容有英文宗教講道、國語讀經、聖經研究、人格訓練、兒童故事、傳記、醫學衛生、佈道、晨禱及晚禱。

識字運動

當時文盲佔全國人口85%。45歲以下之文盲慕道者先有學習識字讀經之機會才加入教會。另有識字運動應用字、修正平民千字課程、研究語調、教授注音符

號等：也有教會所辦之平民學校或教友識字班。[17]語文方面由文理文改為文言、語體改為白話，[18]這是回應了當時社會的現實需要。

宗教教育

1931年組織了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，為了改進主日學校的教材，他們去到各地練習班內研討教科書的內容。提倡開辦查經班，以查經培育會友的靈性，目的要教育信徒獻身事主，訓練慕道友和訓練宗教教育領袖，又開辦研究院以編譯本色教材。為兒童、青年及成年編制新課程，[19]譯本內容大部分是由英文課本編譯過來。

基督化家庭教育

提倡家庭崇拜、每人每日有靈修生活、為別人代禱等。全國教會舉行基督化家庭運動週，按事工的目標而出版材料，形式有書籍、表演、標語、詩歌、兒童祈禱咭等作為教育，也有領袖及母親訓練班。[20]

受託主義

中國教會為要達成自立、自養，教導信徒明白自己所擁有的都是受託於神，如才幹、財產、生命、家庭等：遷新屋、新生嬰孩奉獻禮，人應忠於所託，將一切獻給神。[21]從高伯蘭博士書中編譯受託主義課程，並藉著講道查經中提倡。[22]

青年事業

要讓更多的青年加入教會，必需有青年佈道事工。青年是教會之生力軍，需要向學生及在職青年傳福音。有組織青少年團契、夏令會、修養會以配合他們不同背景的需要。[23]這兩種聚會雖然不是佈道的工作，但教會也著重信徒在忙碌的事奉中要學習安靜，像耶穌退到曠野從神那裏支取能力。[24]

教會鄉村

鄉村教會需要自立自養，農民生活與事業有密切關係，教會要有一個適應鄉村環境的方法；就與金陵神學、齊魯神科合作推動農業工作，改良種子試驗，積極研究及訓練鄉村領袖，以達到各鄉教會能自立自養。[25]其他的建設有平民教育，如：開辦鄉村圖書館、戲劇團、合作社、自衛團等。[26]

五年運動的反省與評估

佈道事工蓬勃發展

「五運」於短短五年間使各地教會佈道事工進入欣欣向榮的境況，雖然有些教會因信仰立場不同，但都在「五運」奮興運動的氣氛感染下，各自組織不同的佈道事工，諸如由宋尚節與計志文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，所造成的福音熱潮席捲全國。按報告指出信徒人數比「五運」前增加了一倍有多，但確實增長人數應未及一倍數量。而佈道的形式多元比，信徒能積極參加佈道工作，見證基督；並且深化佈道的涵意，使信徒能夠整全地把救恩和社會關懷兩者實踐於「五運」早期；讓信徒把神國的公義在社會彰顯，但到後期的福音及佈道工作，只以社會服務代替福音，[27]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鑑，力求在福音與社會服事中取得平衡。

教會勇於回應時代的需要

「五運」大膽領導教會直接與政府合作參與社會各項的服務，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被社會認可和接受。例如在文盲眾多的年代，推行了識字運動，便到有十萬人受惠[28]，既可傳福音，又可服事當時的民眾；今日香港的新移民、低收入人士以及失業的群體，也有關懷的需要，我們能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，在社會上作出美好的見證嗎？

推動教會較為全面的發展

「五運」期間，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，印刷了大批書刊和單張，包括各項事工

的材料、聖經及針對農村重建及平民教育等資料；這些印刷資源因著社會的需要都發揮了大大的功能。此外，亦讓信徒明白進行家庭基督教教育的重要[29]，這也是我們今天教會所值得注意的，隨着香港教會平均年齡趨向中年化，我們已不能只停留於過去的牧養模式，而需加強家庭事工的牧養與重視；另外，「五運」也加強教會對受託主義及奉獻的認識，透過信徒對信仰的委身，使教會達到自立自養的果效；並增強教會對農村建設事業的參與，發揮在社會中的影響力。

三．總結

「五年運動」在誠靜怡博士的領導下，成為中國教會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使中國教會重新有欣欣向榮之象，各地奮興運動接腫而至，既有大規模之聯合運動，亦有個人主領者，如宋尚節之佈道，足這遍全國及南洋、臺灣；王載、王明道亦在各地佈道領會，成績卓著。[30]在當時動盪的局勢中，仍有以誠靜怡為首的教會領袖，為推動教會復興而獻上努力，使三十年代的教會出現一時的奮進現象，使中國教會在困境中迅速成長。但願今天的教會也能在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年代，可以捩臂一呼，帶出奮進的福音熱潮與生命動力，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。--謝成光

[1]「非基督教同盟運動」乃1922-1927年間，在知識界及學術界發起挑戰基督教的運動。

[2]誠榮慈：〈懷念親愛的父親誠質怡〉，《金陵神學誌》，第九期（1998年11月），頁91。

[3]〈誠靜怡小傳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廿二期（1982年3-4月）。

[4]〈誠靜怡小傳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廿二期（1982年3-4月）。

[5]卓新平編：《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），頁229。

[6]查時傑：《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》，上卷，（臺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），頁123。

[7]楊森富：《中國基督教史》（臺灣：商務印書館，1991），頁293。

[8]林榮洪：〈清末民初教會自立運動〉，《今日華人教會》（1996年2-3月），頁19。

[9]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（十）》（臺北：中國教會研究中心），總論，頁5。

[10]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（一）》（臺北：中國教會研究中心），序言。

[11]查時傑：《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》，上卷，（臺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），頁123。

[12]蕭楚輝：《奮興主教會》，（香港：證道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6。

[13]馬克正：〈南京政府建國時期基督教之佈道事工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（1984年11-12月），頁9-10。

[14]蕭楚輝：《奮興主教會》，（香港：證道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8-20。

[15]洪君保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十八期（1981年9-10月），頁15-16。

[16]崔憲詳：〈佈道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43-47。

[17]張福良：〈農村教會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67。

[18]記者：〈識字運動之調查與建議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215。

[19]洪君保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十八期（1981年9-10月），頁15。

[20]李冠芳：〈基督化家庭事工的鳥瞰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61。

[21]洪君保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十八期（1981年9-10月），頁16。

[22]張雪岩：〈受託主義與教會自養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第十二期，頁75-76。

[23]洪君保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十八期（1981年9-10月），頁16。

[24]崔憲詳：〈佈道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45。

[25]周明懿：〈五年來教會之鄉村工作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一期上，頁131。

[26]張福良：〈農村教會〉，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》，第十二期，頁67。

[30]洪君保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與教會》，第十八期（1981年9-10月），頁15-16。